



乾隆

十三年

高王凌◎著

这是一部**政治史**，这是一部**经济史**，这是一部**文化史**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扛鼎力作



经济科学出版社
Economic Science Press

KJ09.307
2021



乾隆

十三年

高王凌◎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Economic Science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乾隆十三年/高王凌著.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2. 6

ISBN 978 - 7 - 5141 - 1926 - 8

I. ①乾… II. ①高… III. ①中国历史 - 古代史 - 研究 - 中国 - 乾隆 (1736 - 1795) IV. ①K249.3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00099 号

策划编辑: 王 毅

责任编辑: 马永旺 张 力

责任校对: 刘 昕

责任印制: 李 鹏

乾隆十三年

高王凌 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社址: 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编: 100142

总编部电话: 88191217 发行部电话: 88191537

网址: [www. esp. com. cn](http://www.esp.com.cn)

电子邮件: [esp@esp. com. cn](mailto:esp@esp.com.cn)

北京东海印刷有限公司印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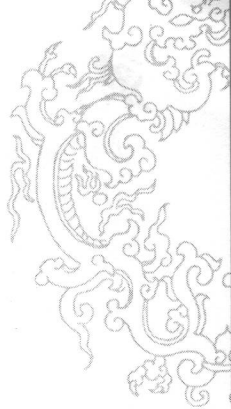
710 × 1000 16 开 15.5 印张 180000 字

2012 年 6 月第 1 版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141 - 1926 - 8 定价: 32.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电话: 88191657)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言

本书取名“乾隆十三年”，如果再有一个英译本，似乎就可以学黄仁宇先生，加一个副标题了：“1748，一个失败的记录”（一笑）。

黄先生是学不来的。但可以告慰的是，在这次谋求出版的过程中，遵从学生与友人的建议，终于鼓起勇气，将全书修改了一遍。虽未能达到完全“口语化”的目标，但尽量使之好读，也算费了些力气（现在仍有许多不好读的地方，但尽可“一目十行”，略过去了；又，引文中未注明者皆出自大清实录之《高宗实录》，不妨按图索骥）。

本书和《史记》等古书一样，大量地引用了原文（只不过古书不注明出处，一般人意识不到而已），原因之一，是有许多东西我们其实解释不了，却拿现代观念，我们手头的这点儿本事强加解释。就不如留出空间给予读者，让大家自己想象。

我治清史，前后已经有30多年时间，渐渐也读了不少材料。过去最“喜欢”的皇帝，是清圣祖（康熙），觉得他是一位好皇帝，你从他那些谕旨中，就能读出他的人品性格。很仁慈，也很宽大。不喜欢的，是世宗（雍正）。但是美国学者很喜欢他，觉得他治国有方，特别能干。高宗（乾隆）呢？似乎更像一个“纨绔子弟”，没经过那些风霜雨



露（对比起来，康熙可谓“长于忧患”了）；人是聪明（也有外国学者居然以为他“智商低”的），但有点儿“聪明反被聪明误”的味道。远没有圣祖那么高大、宽厚。有意思的是，他即位不久，很年轻时就说过，若在位超过六十年（古今中外能统治这么长时间的并无几人），即当退位云云，不要超过皇祖康熙，不想竟如所愿……

没想到，在职业生涯的最后一段，阴差阳错的，我要写乾隆了，这跟过去读史的角度大有不同。以前只是做经济历史（包括经济政策、经济思想史），现在则要考虑乾隆一朝全面的情况。这就需要重新认识这个人 and 这一朝的历史。

我一直以为，在中国，政府（国家）从来都具有第一等重要的地位。跟国外学界不同，在中国不会闹“忘了政府”的笑话（现在发现，国内也有了类似现象），相反，几乎所有的请愿、闹事、造反，差不多都是冲着政府去的；老百姓遇着点儿什么问题，也无不归罪于政府，或寄望于政府，所有这些几乎贯穿了中国几千年的历史，直到现在（参见拙作《政府作用和角色问题的历史考察》，《序言》，2002年）。

这样看来，中国所有的事儿，都充满了政治色彩，我过去写的经济政策，就不但是“经济史”、“思想史”（小书《活着的传统》，就为北京大学出版社列入“思想史丛书”，2005年），也是一段“政治史”。就拿今天来说，经济发展成为国家的头等大事，谁能说不是最大的政治呢！

现在写乾隆，更完全进入了政治史的领域。有人认为，应该在里面写入一段经济史或社会史，或把它分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几个方面来写，我以为都应三思。它可能从侧面或某种角度反映经济的社会的的问题，但《乾隆》本身，只是一个政治史（当然这不能理解为一切都是政府统管），如此而已。

把《乾隆》（现在的《乾隆十三年》）写成一部政治史，这是我的第一个想法。

所谓“乾隆十三年”，从中文来说，可以有两个意思：一是指公元1748年一年；二是指乾隆头十三年的十几年间，我采取的是后一层意



思。它大致从雍正十三年（八月）到乾隆十三年（展宽至乾隆十五年）为止。

也许更重要的，是它还涉及写作正史的一个“道义原则”问题。

什么是“道义原则”？有没有这么一种写史的“道义原则”？

我曾在一篇短文（“修史工作的不同路向”）中引述钱穆先生的话说：

研究历史有两种观点，一种是“历史意见”，一种是“时代意见”：“要讲某一代的制度得失，必需知道此制度实施时期之有关各方意见之反映。这些意见，才是评判该项制度之利弊得失的真凭据与真意见，……我将称之曰历史意见。”“而后代人单凭后代人自己所处的环境和需求来批评历史上已往的各项制度，那只能说是一种时代意见……我们不该单凭时代意见来抹杀已往的历史意见。”“我们此刻重视这些历史意见，其意正如我们之重视我们自己的时代意见般，这两者间，该有精义相通。”（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前言》）

这一问题，正涉及了我们今天修史的基本立场和道义原则。对于某段历史，此刻该不该修，如何去修，难道还有什么“道义”问题存在？有人会这样质疑，我却觉得还是有的。比方说，已多年没有修过正史，大家都没有经验，难道没有一个该怎么修的问题，值得好好讨论一番？我想，起码有一点可以强调的，那就是要尊重“当事人”，尊重“古人”的意见，好好听听当年那些人是怎么想的，本人到底有什么意见，他们对自己行为的解释。万不可一上来，还没怎么着呢，就大帽子四下翻飞，旧帽子之外加上一堆新帽子、新新帽子，那我们算是干啥呢？

我也由此想到，我自己过去的许多研究（主要侧重于社会经济史），其中虽有些道理，但怕也隐含不少问题。那些“社会科学”的基本概念，都是由西方传来，在中国传统是不大看重的；把它加诸古人古史似亦无可厚非，那些遗产也很值得总结（甚至不用现代观点打通了看，可能就总结不出来）。但是那仍不是古人自己的观点，不是“传统语境”的自身解释，——做学问，不做到这一地步恐怕还是不行的。





所以，在尽量展示各种“时代意见”（如“共时现象”、“国家视角”等等）的同时，也充分考虑到古人本身的“历史意见”，这就是我要遵循的一个原则。

十八世纪，中国与西方国家同时出现了历史上罕见的“共时现象”，即人口的持续增长与政府职权的加强。遂有从垦政，到农政、矿政、粮政一系列的政策探讨。从此，中国开始了她“现代化”的努力，这，可以视为对中国历史（近现代史）的一个新的解释，所谓时代意见。它表明，清史还是具有它的跨时代价值的（参见拙作《从清代农业政策看当代农村变革》，《炎黄春秋》2011年第5期）。

不过，同时还必须重视清人自己的解释，他的目标是什么呢？对高宗皇帝来说，就是“回复三代”（不是所谓“盛世”或“统一”、“西师”和“南巡”），实现儒家的经典命题，确立清代在几千年中国史中的至高地位，——我的打算，不外是把它讲成一个有头有尾的完整故事。

所以，本书可以说是对昔日历史的一个现代诠释，也是对当代改革的一个历史说明。是一种“古今两相观照”和带有时代气息的研究。重新阅读这些史料，我们可能也不难发现，其中许多问题我们还没有意识到呢（特别是有关传统政治理念的部分）。

有国外的朋友就此提出一些问题，我回答他们说：

如果我能够见到乾隆皇帝（起君于地下），我就要做一番“口述史”了，我要问问他：

为什么乾隆朝前十三年史料畸缺呢（对比雍正朝和乾隆十三年以后）？是不是有什么人做了手脚？

我写您打算“回复三代”这节，您满意吗，为什么以后就不提此事了？有什么难言之隐？

“粮政事件”呢，这些难道不是大事里的大事？您愿意像一般史书那样，把它们都遮蔽起来？

您后来搞了那么多“文字狱”和“政治案件”，为什么要这样做？您一定有个想法，我的猜测准不准确？

我如果能重写一部《皇朝经世文编》（只收十八世纪的东西），您会有什么想法？如果说，对“经世派”有过贡献的陆燿（著有《切问斋文钞》）、庄存与（开创自龚自珍、魏源到康有为一脉今文学派）都曾参予密勿，对您的想法有一定了解，为什么您还不能满意？今天又可以怎样补救？

您对有关传记中的哪一部比较喜欢？哪些最不喜欢？为什么？……

据阎宗临《传教士与法国早期汉学》，在十八世纪的乾隆年间，法国思想家伏尔泰特别赞美乾隆皇帝，他在给瑞典王的诗作中写道：

我常给中国皇帝去信，
直到而今，他没有给我一点儿回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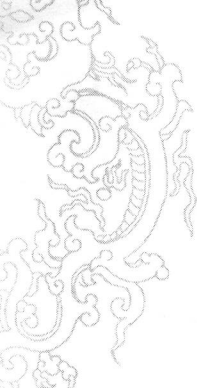
这真遗憾。

是为“序”。



序

言



目 录

一、楔子

- 1. 初意十三年必有拂意之事.....3
- 2. 初政，重拾人心.....12

二、经济对策

- 3. 面对人口问题.....23
- 4. 垦政的变化.....29
- 5. 永不加赋政策的完结.....34
- 6. 新的农业发展政策的形成.....36
- 7. 提倡工业生产.....41

三、加强政府

- 8. 共时现象，扩大政府职权.....49
- 9. 国家视角，兴举各项建设.....56

四、回复三代

10. 历史意见，回向三代.....	73
11. 议改土地制度.....	87
12. 劝减田租.....	94
13. 粮政上的新举措.....	102

五、无奈与失落

14. 盛世之累.....	115
15. 吏偷.....	120
16. 民玩.....	129

六、预言应验

17. 自失.....	139
18. 尾声，不同角度的观察.....	1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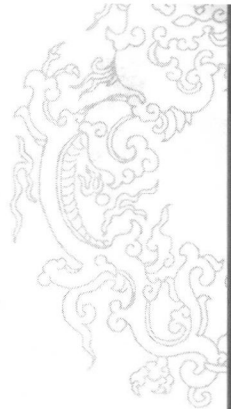
附录

另类的金川.....	171
清代政治史之我见.....	195
十八世纪，二十世纪的先声.....	210

一、楔子

乾隆十三年

QIANLONGSHISANNIAN



1. 初意十三年必有拂意之事

大清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二，西元 1735 年 10 月 7 日，在历史上也许是个再平常不过的日子。

虽然民间流传着有关皇上（庙号世宗，谥宪皇帝）的各种流言飞语，如弑父、夺嫡、杀弟、逼母，却与百姓日常生活无大关联。对雍正行政的“苛严”，大家也逐渐习惯，甚至找出了应对的办法。尽管受害者颇有怨言，批评声此起彼伏，但也有几分谅解，如吏治整饬的成效，为有目共睹。

说它平常，是这天侵晨，皇帝还依然上朝。但到深夜“漏将二鼓”，“忽闻宣召甚急”。大学士张廷玉趋至圆明园，“始知上疾大渐，惊骇欲绝”。其时皇上已然昏迷，至子时，“龙驭上宾矣”。另一大学士鄂尔泰“深夜无马，骑煤驴而奔，拥今上登极。宿禁中七昼夜始出”，其中三日夜未进粒食。那几日间，正不知有多少的混乱、惶惧、无措，和料想不到的事情，都被遮盖了起来。

匆遽之中，诸王、大臣寻出雍正元年所封密函，拥皇四子弘历即位，改号乾隆。当时又有几人能够想到，他竟统治了中国六十四年之久（包括太上皇四年），方于八十九岁高龄驾崩（庙号高宗，谥纯皇帝）。

他名正言顺地即位了。像是一个“大少”，万贯家财的年轻继承人。也许这样的比喻并不恰当，他继承的是一个“帝国”，手里握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施展开来，似乎又是那样老练，与二十五岁的年



龄不符。大行皇帝《遗诏》里的一句话，“俾皇太子弘历成一代之令主”，就像一个预言，更像一个即将来临的前景，展现在大家眼前。

在历史上，无论是一个新朝代的产生，还是一个新君的即位，大都不免发生一些变故。无论怎样讲求“以孝治国”，新的政策，新的政治风尚，总是要出现的。他却注定要给历史打下深深的个人印记。而且，有证据表明，他多少是有意识地这样做的。

在中国传统社会，事先就带有一定的政治理念，并大声予以宣示的，可以说少之又少。因此，乍看起来，他既像一个传统政治理想的热诚追求者，又有几分像似今日竞选上台的民选政治家。或者，时代需要这样一个人，让他一身而兼二任？

从此，开始了他的帝王生活：每年元旦，先“诣堂子行礼”，后回官接受百官朝贺。次日，及仲春秋朔日，于坤宁宫祭神。^①

每晨起必以卯刻，长夏时天已向明，至冬月才五更尽，尚须燃烛寸许始天明也。日日如此，此犹寻常无事时，当西陲用兵，有军报至，虽夜半亦必亲览。每晨起膳后，阅部院所奏事，及各督抚摺子毕，以次召见诸大臣，日必四五起。最后见军机大臣，指示机务讫，有铨选之文武官员，则吏兵二部各以其员引见。见毕，日加巳，皆燕闲时也，或作书，或作画，而诗尤为常课。^②

即位之初，曾焚香告天默祷：皇祖御极六十一年，予不敢仰希。若邀昊苍眷佑，至乾隆六十年，即当传位皇子，归政退闲。^③果然，他就做了那么多年皇帝，于乾隆六十年退位，并未“退闲”的又做了四年太上皇，于八十九高龄才撒手西去。

然而，更重要的预言，不在于此，而在乾隆十三年（公元1748年）。

皇帝虽说自己是一位“福、禄、寿、禧”四全之人，晚年又自诩

① 孙文良、张杰、郑永川：《乾隆帝》，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页202~203。

② 赵翼：《簞曝杂记》卷1。

③ 《高宗实录》卷1081。

为“十全老人”，但在一生之中，实有几件不如意事。这自然不能大肆渲染，甚至要被刻意遮盖，但却于其一生关系颇大。其中第一件，就发生在乾隆十三年。

所以他事后说：“朕御极之初，尝意至十三年时，国家必有拂意之事，非计料所及者。”（乾隆十三年十二月辛卯谕）

为什么这样说呢？乾隆十三年，他又遇到了哪一些事，让他觉得以前的“预言”有了应验？

第一件事，是皇太子及皇后之死。

乾隆十二年除夕，皇七子永琮突然出痘而亡（年二岁），他虽未经册立，但已默定继承帝位。在这之前，曾定为皇太子的次子永璉，也于乾隆三年患病不治（九岁）。两位皇子皆为正宫娘娘皇后富察氏亲生，看来，她无法承受这样的打击，乾隆十三年三月，终于在巡幸山东途次，不幸崩逝。

据说，爱子与爱妻的相继过世，使皇上一反常态。有学者根据他事后写的数百首悼亡诗，证明他对皇后情爱之笃。结果他变得暴躁易怒，严苛无情，动辄大发雷霆，——如果那是一个“正常死亡”，皇帝可能如此“精神失常”么？

首先成为他的目标的就是皇长子永璜和三子永璋。他们因在丧礼中没有哀伤的表现，“于人子之道毫不能尽”，被宣布“断不可承继大统”，师傅和俺达一同受到处分。

四月，皇上发现翰林院草拟的满语册文中，误将“皇妣”译成“先太后”，欲传旨查问，不料诸大臣皆已散朝。管院尚书阿克敦于是被革职问罪，刑部加重定为“斩监候”，盛怒的皇上以为尚轻，改交吏部治罪。结果，刑部堂官署理满尚书盛安、汉尚书汪由敦、侍郎勒尔森、钱陈群、兆惠、魏定国均被革职留任，阿克敦斩监候，秋后处决（后赦）。

五月，因皇后初祭物品不够洁净，光禄寺卿、少卿、署丞被降级调用。

工部则因办理皇后册宝不敬，全堂问罪。





礼部因王公大臣行礼多有不妥，尚书海望、王安国降级调用，其他依律处分有差。

宗人府也几次受到申饬。

其后，外省官员也被殃及。皇后逝世消息公布后，一些官员并没有具摺奏请来京吊祭，这引起了皇上的不满，特别是对那些满族大员。两江总督尹继善、闽浙总督喀尔吉善、湖广总督塞楞额、漕运总督蕴著、浙江巡抚顾琮、江西巡抚开泰、河南巡抚硕色、安徽巡抚纳敏等五十三名，均在惩处之列。

风暴继续扩大，这一次是“违制剃髮”。六月，皇帝宣布，“本朝丧礼，薙髮之罪最重”，一经查出即行正法。但它颁发得晚了一些，一些官员并不清楚这一祖制，有的则已经剃头。首先被发现的是锦州知府金文淳（几被正法），^①继之有盛京、杭州、宁夏、京口、凉州、四川等地的八旗驻防官兵。但使皇上怒不可遏的是江南河道总督周学健，不但和他属下文武官员全在百日内剃头，而且朝廷内外风闻已久，竟无一人奏闻。为此而受到严谴的有总督尹继善、大学士高斌，周学健（另有受贿罪）与塞楞额则被赐令自尽，湖南巡抚杨锡绂、湖北巡抚彭树葵均被革职。

这些都是中国官方史料的记载。在传教士刘松龄（Augustin F. Hallerstein, 1703~1774）笔下，事情就不仅有这一个层面，乾隆十四年十一月，他在一封私人信件中写道：

一片乌云聚集在中国的天空之上……

在福建，他们用刀和绳索杀死了属于多明我会在的一个主教和他的四个助手；在南京，我们耶稣会的两位神父也被杀了；还有在江西，一个方济各会的人也被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

在这之前，乾隆十一年（1746年）六月，福建福安县破获了一起西洋教士秘密传教的案件，四位神父以及福建教区主教白多禄被抓了

^① 《啸亭杂录》卷2《盛司寇》：金文淳薙髮事发，上震怒，命立诛之。刑部尚书盛安请上宽之。上怒曰：汝为金某游说耶？命与金文淳同置于法，后上悔悟，命侍卫驰骑并赦之。

起来。

当时任福建巡抚的周学健几次上奏问题的严重性：“西洋人精心牟利，独行教中国一事，不惜巨金。现据白多禄口供，澳门共有八堂，一堂经管一省，每年由西班牙国拨出银款，由吕宋转运澳门各堂散给。”第二年（乾隆十二年）五月，白多禄被处斩。其余四名教士被“缓决”一年以后，乾隆十三年秋，皇帝终于做出决定，将监候待决的费若望等四名传教士在狱中秘密处决。为了防止消息外逸，下达这项绝密指示时都没有通过军机处，而是让陞辞回闽的将军新柱将旨意直接传达给闽浙总督喀尔吉善，然后以“瘐毙”——在监狱中正常死亡——奏闻。

但消息毕竟走漏了一部分，据天主教方面描述四教士之死的《流血记》说：是年秋，德（方济各）神父系十月某夜勒死于狱中；华（若亚敬）神父在闽县监狱，以石灰塞住五官，使其窒息而死；费（若望）、施（方济各）二神父则同被绞死狱中。

先是，江苏昭文县亦查获了秘密传布天主教的意大利人谈方济和葡萄牙人王安多尼，江苏巡抚安宁以宣传邪说、诱惑居民，请旨将其处以绞刑。皇帝为此密谕：此等人犯若明正典刑，转似于外夷民人故为从重；若久禁囹圄，又恐滋事，不如令其瘐毙，不动声色，而隐患可除。今王安多尼、谈方济二犯，亦应照福建之案速行完结。于是两名传教士均以“在监病故”之名，于乾隆十三年闰七月二十日在狱中绞死。

稍后，在四川、山西、山东、江西、广西、湖南都发生了大大小小的仇教事件。^①

有如晴天霹雳，一系列案件在外国传教士中引起的感受可想而知。为此，耶稣会在中国的总会长、任职大清钦天监正的刘松龄愤慨地写道：

① 以上参见郭成康：《乾隆大帝》，中国华侨出版社，2003，页912~917；黄爱平：《从清代档案看雍正乾隆时期福建地区的传教与禁教》，《西学与清代文化》，中华书局，2008，页189~196。

